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6)08-0032-06

跨语传播中的应用符号学理论

——再谈“中国共产党”的英译

赵心树 李 聪

(北卡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美国 北卡 教堂山, 27510)

[摘要] 本文以新的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译名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是错误的。作者以此为例进一步讲述一套应用符号学的理论, 批评“词字翻译”, 主张“传通翻译”。本文还指出, 应用符号学理论可以从重新诠释后的老子、孔子和近现代“信达雅”概念中找到源头。

[关键词] 应用符号学, 词字翻译, 传通翻译, 信达雅, 跨语传播, 中国共产党, 名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4年夏,《国际新闻界》^[1]发表《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词字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一文(以下简称《信息与词字》),提出,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的习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是英语中 communist 有强烈的贬义,而“中国共产党”中的“共产”是中性或褒义;二是英语中 party 代表不拥有永久执政权的政治利益团体,而“中国共产党”中的“党”更接近于一个政权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义)政府架构中的一个中心部门。这个误译不动声色地、经常不断地、涓滴成海地妖魔化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以及整个中国在英语世界的形象,侵损着中国人民的利益。

据此,《信息与词字》提议为“中国共产党”寻找更为恰当的英译,并提出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作为一个选项。本文将试图从此例中总结出一些符号学与名学的道理来。

为什么克里说“中国不受共产党领导?”

好像是要为《信息与词字》^[2]一文作证,2004年7月18日,以倾向单边主义著称的《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全面攻击总统候选人克里的“中国观”和“中国政策”。所列第一条“罪状”是,克里曾在2001年提出,中国不再存在一个“Communist 政府”,并为此同当时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进行了一场“奇怪”的辩论。^[3]说“奇怪”,是讥笑克里没有常识:人人都说中国是由 Communist Party 领导,你克里却说中国没有 Communist,岂不可笑?

[收稿日期] 2006-06-20

[作者简介] 赵心树,男,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李 聪,男,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其实,作为参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克里当然清楚几乎人人都说中国由 Communist 掌权。他说的是,Communist 这个词曲解甚至妖魔化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克里的观点显然比赫尔姆斯和特里普利特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也更有利于美国自己的长远利益。但在这场辩论中,克里却处于下风,因为他的对手拥有一个心理上的杀手锏:中国人坚持自称 Communist,难道你克里比中国人更明白中国人自己是谁?

克里和他的对手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坚持自称 Communist?而中国领导人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现状,他们不了解的是,Communist 在一般西方百姓心目中具有强烈贬义。于是有了这场看似奇怪可笑的辩论。

更有甚者,在为中国的读者介绍这场辩论时,《参考消息》把 Communist Party 一律译成“共产党”。于是,克里的观点变成了“中国已不受共产党领导”。在中文的语境中,克里的观点显得更为奇怪可笑。其实,真正奇怪可笑的不是克里的“中国观”,而是“中国共产党”与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之间貌合神离的对应关系。

“词字翻译”和“传通翻译”

克氏与赫氏的辩论或《信息与词字》^[4]的建议都没有引起中国翻译界或外交界的注意。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外文符号、中文符号、指称对象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组合,这个组合可以也只能从词典里找到。背离词典就是错误,有欺骗之嫌。在词典里,China 就是“中国”,Communist 就是“共产”,party 就是“党”,于是,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或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就成了唯一正确的,其他翻译都是不准确或不规范的。我们称这种观念为“词字翻译”(word-character interpretation),简称“词字译”。

《信息与词字》一文主张另一种观念。这种

观念注重信息传播,以传播效应为翻译决策的唯一目标。这种观念称为“信息翻译”。鉴于“信息翻译”在翻译界有时被用来指称另外的概念^[5],本文将改称其为“传通翻译”(communicative interpretation)。^[6]以下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传通翻译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早有先例。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把自己的英文名定为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7]。若对照词字,英文译名多出两词:and communication。当年人大成立新闻系时,没有广告、公关、出版、基础传播等课程或专业。在陆续增加这些课程或专业后,用“新闻”去涵盖显得帽子太小。但要改名,又会割断几十年的传统,伤害师生校友的感情;于是就犹犹豫豫地沿用着“新闻学院”。但是,他们对任何一个英文名都不存在感情的依恋或传统的羁绊,于是就毫无顾忌地使用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若死守词字转换,这个翻译似乎是错的,但从信息传通的目标来看,它却比 Journalism School 更好,因为它更贴近指称对象的实际情况。

又如,中文里的“酒店”、“饭店”若按词字翻译应当为 wineshop 和 cooked rice store。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和初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中,还真有人这么翻译,例如把上海的“香格里拉酒店”翻成 Shangri-La Wineshop,把“和平饭店”翻成 Peaceful Cooked Rice Store,把“国际饭店”翻成 International Cooked Rice Store,或把北京的“贵宾楼饭店”翻成 Precious Guests' Building Cooked Rice Store。当我给这些作业扣分的时候,有学生还搬出词典来跟我争辩:“酒”是 wine,“饭”是 cooked rice,“店”是 shop,store,“酒店”条下清清楚楚地列着 wineshop^[8],何错之有?

但是,这些旅店却坚持把自己翻译为 Shangri-La Hotel、Peace Hotel、Park Hotel(上海国际饭店)和 Grand Hotel(北京贵宾楼饭店)。虽然,从词字上看,中文名与对应的英文名相距十万八千里;权威汉英词典的“酒店”条下也没有列出 hotel^[9]!但我们却未见有人指责他们

欺骗作假,因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传通翻译。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饭店”只卖饭菜,“酒店”只卖酒水,在当时把它们翻译成 cooked rice shop, liquor store 或 restaurant 并不错。后来饭店、酒店容留客人过夜,渐渐兼营、主营、以至专营客房出租,甚至不卖饭不卖酒了,但中文的名号却因循不变,仍然称“饭店”、“酒店”,这时,把它们翻译成 cooked rice shop、liquor store 或 restaurant 就成了错误甚至是笑话。“酒店”与 liquor store 的对应关系以及“饭店”与 restaurant 的对应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与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的对应关系如出一辙;只是前两组对应关系的建立与解除早已在几十年、上百年前完成,而后者的对应关系外表上平稳如旧,实际上存在着并带来了无法回避的麻烦及问题。

词字翻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其中有的令人瞠目。2004年夏,在我宿舍附近的西直门外南路上,有一家“金米兰”川菜馆;在中英对照的菜单中^[10]“夫妻肺片”被翻成 husband and wife lung slice。我的美国学生看了,(半开玩笑地)问我,谁敢吃用人家夫妻的肺切成的片。还有“四川老坛子”成了 Sichuan old the son of Tan,有美国学生理解为“谭某人在四川的大儿子”。^[11]

不要窃笑饭馆老板英语糟糕。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与以上各例类同,都属词字翻译,其心理与语言机制完全一样:翻译者或是没有理解中文原文意指的概念,如“饭店”实指旅店,“坛子”并非坛某人之子,“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权机关,等等;或是没有理解所选外文在外国人脑中代表的意义, rice shop 只卖米, party 只能是一个利益团体,等等。正由于“不理解”,翻译者就只能迷信词典,进行机械的词字翻译。

“信、达、雅”的信息传通解释

由此引伸出一个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根据信息传通理论重新解释中国翻译界的经典

信条“信达雅”。

信者,翻译者忠于原著的实事求是的初衷和态度。这儿强调“初衷和态度”,是基于如下认识:翻译的唯一目标是信息的传递,翻译优劣的唯一标准是信息的精准传递;但是,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环境中,百分之百绝对精准的信息传递往往是不可能的。其实,即便是在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中,由于作者、说者、读者、听者、观者的知识构成和观念组合总有不同,百分之百绝对精准的信息传递也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更何谈跨文化跨语言的精准传递。于是,我们能够要求于译者的,就只能是一个忠于原意、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尽力而为的工作,是为“信”。

达者,信息内容的精准传递。以上已谈到,信息传递是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衡量翻译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儿的“达”是一个渐续的概念。百分之百的“达”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百分之百的“不达”是我们努力避免的困境。绝大多数的翻译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的达得多一些,有的达得少一些。对一个具体的翻译,我们只能期望尽可能的达,或在已知选择中最接近于绝对的达的那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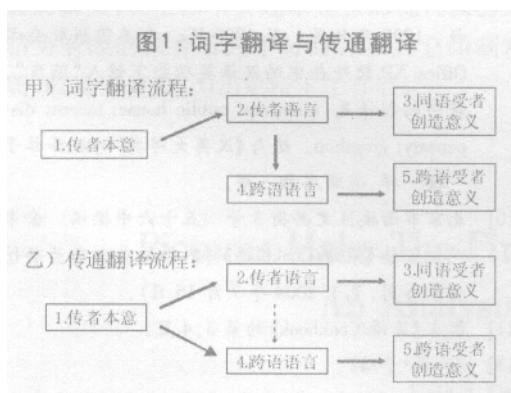
雅者,信息形式的精准重现。文有文风,语有语气。信息传递所指的不仅仅是其内容,也包含其形式。同“达”一样,“雅”也是一个渐续的概念。因此,在我们追求尽可能的“达”的同时,我们也追求尽可能的“雅”。请注意,这儿的“雅”未必是指形式的“文雅”或“漂亮”,而是指忠实于原文原著的形式,要尽可能精准地重现这一形式:若原文原著是“文”的,就要尽量重现其“文”,若原文原著是“俗”的,就要尽可能重现其“俗”;类似地,(是否改为“譬如”?)原文原著或美艳,或粗鄙,或华丽,或平白,译文就要尽可能重现这种美艳、粗鄙、华丽或平白。

把“达”和“雅”的内涵重新定义为信息内容的传递和信息形式的重现,对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者不能再满足于理解词字语汇的词典定义,而必须花功夫理解作者的原意与对方文化中目标人群的知识构成、观念组合

和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理解对方语言中的词字语汇在这些入脑中 所代表的活的意义;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算是真正的“信”,才能挑选出最佳的翻译,才能尽量精准地传递信息内容和重现信息形式,才能产生尽可能高的“达”和“雅”。

词字翻译与传通翻译的流程区别

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图1分析词字翻译与传通翻译的流程区别。其中甲1 甲2 甲3 的流程显示,在同语传通中,传者通过自己惯用语言的符号表达原意,受者从同一个语言符号中再创意义。如果受者脑中呈现的意义百分之百再现了传者的原意,那就是完美的传通。而实际上,绝对完美的传通很少出现,在信息比较复杂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所谓意义的再创并不是受者大脑简单地接受语言符号中的信息,而是新接受的语言符号激活脑中已有的信息,与原有的信息结合,而构成新的信息组合。由于每个受者原有的信息构成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再创的意义不仅很少百分之百重现传者的原意,而且不同受者所创造的意义相互之间也多少有些不同。



同语传通尚且难以做到完美无缺,跨语传通则更难,因为信息损耗更大,误传的机率也更大。图1中,甲1 甲2 甲4 甲5 的流程显示跨语传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的受者与同语言传通的受者不是同一群人,与传者也不在

同一个语言文化圈中。跨语受者脑中原有的信息构成与传者及同语受者脑中的信息构成很不一样,所以,跨语受者再创的意义不仅容易偏离传者的本意,而且往往与同语受者再创的意义很不一样。

图1中,甲1 甲2 甲4 甲5 的流程凸显着跨语传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跨语受者接触的语言符号(甲4)不同于传者惯用的语言符号(甲2)。传统的机械翻译把两种语言符号对照词字进行转换,于是把单语传通中的三步流程变成了跨语传通中的四步流程,多一步就多一个信息损耗和误传的机会,于是就增加了跨语受者误解传者原意的机率。

图1中,乙1 乙4 乙5 的流程显示了传通翻译的理念:遇到关键的概念,翻译者应当努力进行“抽名思维”,也就是绕过传者原用语言符号(乙2),努力用目标受者惯用的语言符号(乙4)去直接传递传者的原意(乙1),以尽可能减少信息损耗和误传,使得受者脑中再创的意义(乙5)尽可能接近传者的原意(乙1)。从乙2到乙4之间的虚线箭头则表示,在进行传通翻译的时候,翻译者仍然可以参考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借助词典和其他工具书,但这只是辅助。

例如,《信息与词字》^[12]一文建议用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替代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英译。若循词字翻译的习惯,对着词典比较中文词(甲2)与英文词(甲4),会觉得这个建议错得离谱,甚至是荒唐。但是,若按照传通翻译的要求,绕过中文(乙2)直接比照传者原意(乙1)与英语受者所再创的意义(乙5),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新译法有两方面的优势:1) 新译法中性偏褒,就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共一样,而现译法有强烈的贬义;2) 新译法可以指称一个政权机关,也可以指称一个利益团体,这更符合中共“更近于一个政权机关”这一现状,而旧译法只能指称一个利益团体。

图1的乙3与乙5显示,在跨语传通中,即便采用了传通翻译,其受者仍然不同于单语

传通的受者,所以,其信息损耗一般仍将大于单语传通的信息损耗。但是,传通翻译把信息损耗的两个主要源泉减少为一个,于是就大大减少了损耗。

孔子、老子的名学理论与“中共”的英译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3]所谓“名正”,未必就等于“选用语词符合词典的要求”,而应当被解释为:“一个语言符号在传者与受者心目中代表着同一个概念”;所谓“名不正”,就是同一个语言符号在传者和受者心目中各自代表不同的概念;于是“言不顺”,传者说“好”,受者却听成“糟”,传者说“左”,受者却听到“右”;于是“事不成”:友好合作因误解而夭折失败,无谓争斗因误解而生成发展。“中国共产党”英译之误,就误在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的歧义:在多数中国传者的心目中,在多数西方受者的心目中,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14]从符号学的角度,此段可译为:“概念事物是可以解释的,但概念事物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变化的;语言符号也是可以解释的,但符号的意义及符号的音与形也是变化的。所有的概念事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相应的语言符号;当人们赋予一个概念或事物以特定的语言符号的时候,人们就向着理解它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共产党这个团体从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变化,此为“非恒道”之一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在 1921 年代表着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而在 2006 年代表着一个政权机关,此为“非恒名”之一例。在西方世界,Communist 在 1921 年偏褒义,而在 2006 年具强烈贬义,此为“非恒名”又一例。

正因为“非恒”,也就是变化,所以造成今日英文名的“名不正”,造成对外交往和对外公关中的种种“言不顺”,促成国际政治、经济和

文化事务中的种种“事不成”。为了恢复“名正”,我们必须拆散“中国共产党”与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之间已存在八十五年的配对,是为“非恒名”再一例。

注释:

- [1-2][4][12] 赵心树《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词字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 4 期,总 126 期,第 12-17,24 页。
- [3] 《美报载文攻击克里的“中国观”》,《参考消息》2004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第 1 版,田宝剑编。原作者威廉·特里普利特,原题《在中国问题上错了...在台湾问题上也错了》,原载于美国《华盛顿时报》2004 年 7 月 18 日。
- [5] 例如,周志柏《翻译工作在科技信息转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总第 98 期),第 22-25 页;刘春燕《论科技文体的信息翻译模式》,《江西通信科技》,2001 年第 3 期,第 44-46 页;刘春燕:《论科技文体的信息翻译模式(二)》,《江西通信科技》2001 年第 4 期,第 42-44 页。
- [6] 参见张旭《关于翻译研究术语汉译的讨论》,《中国翻译》2004 年 7 月,第 25 卷,第 4 期,第 81-84 页。
- [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管国际交流的院长助理钟新教授在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电话讨论中为作者提供了这一“官方英语名”。谨此致谢!
- [8][9] 吴光华主编《汉英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 年 8 月,第 1390 页。在美国微软公司 Office XP 软件包中的汉译英功能下键入“酒店”,获得的翻译是:wineshop; public house; tavern; dispensary; grogshop。这与《汉英大辞典》的解释单子一模一样,连顺序都一样。
- [10] 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3 号(五十六中操场)金米兰大酒楼《菜谱/Cookbook》(署名北京金米兰餐饮有限公司,见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
- [11] 该店《菜谱/Cookbook》的第 3、4 页。
- [13] 《论语·子路》。
- [14] 见梁海明译注《老子·道德经·上篇·道经·第一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3 页。更常见的版本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除了“恒”作“常”外,就是少了几个“也”字,实质意义似无区别。

Applied Semiot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ZHAO Xinshu, LI Cong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ites additional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mismatch in meaning what it purports to translate, Zhongguo Gongchandang, therefore a mistranslation. Further, the article uses this example to illustrate a theory that the authors call “ applied semiotics. ” The theory criticizes the commonly practiced “ word-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 ” and advocates “ communicative interpretation. ” The article also traces some elements of the applied semiotics to a reinterpreted version of some Confucius' and Lao Zi's writings, and the more recent principle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Xin Da Ya.

Key Words: Applied Semiotics, Word-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ve Interpretation, Xin Da Ya

[责任编辑: 刘小燕]

(上接第 21 页)

计,近 30 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经超过过去 5000 年的信息生产总量。有鉴于此,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认为,“ 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6]而《巴黎竞赛》就是进行信息节食的助手,它为受众筛选、过滤信息,定格最有意义的瞬间,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为精力有限的读者节约了时间;同时,它印制精美,收藏方便,也为历史留下了存照。

注释:

- [1] 杨贵山、林成林、姜乐英《世界出版观潮》,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124 页。
- [2] 《巴黎竞赛》内部资料。
- [3] [法]阿尔贝·杜鲁瓦《虚伪者的狂欢节》,逸尘、边芹译,时事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70 页。
- [4] 出血照片:系编辑术语,即图片的一边或双边超出开本,经裁切后不留白边。
- [5] 余敏主编《国际出版业状况及预测》,中国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 131 页。
- [6] 《书摘》杂志 2001 年第 4 期第 93 页。

Pictures Make The First News Weekly in France: An Analysis on Paris Match

CHEN Yujie, ZHOU Xiaopu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growth and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Paris Match, and makes an analysis on its special features from two perspectives, namely content and format. These features may be a kind of reference to China's media.

Key Words: Pictures Reporting, Paris Match

[责任编辑: 刘小燕]